

CAMBRIDGE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应奇 刘训练 主编

政治心理学

▲
Jon Elster
[美] 乔恩·埃尔斯特 著
陈秀峰 胡勇 译

POLITICAL PSYCHOLOGY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OLITICAL PSYCHOLOGY

政治心理学

Jon Elster

[美]乔恩·埃尔斯特 著

陈秀峰 胡勇 译



Political Psychology, First Edition (ISBN 0-521-42286-8)

by Jon Elster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Beijing Branch 2010

本书版权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共同所有。本书任何
部分之文字及图片，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8-9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心理学 / (美) 埃尔斯特著；陈秀峰、胡勇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4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书名原文：Political Psychology

ISBN 978-7-5463-2611-5

I. ①政… II. ①埃… ②陈… ③胡… III. ①政治心
理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855号

书 名：政治心理学
著 者：[美]乔恩·埃尔斯特
译 者：陈秀峰 胡勇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刘训练
责任编辑：史 宁
封面制作：宋 氓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611-5
定 价：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缩略语

在该书中使用了下列缩略语：

vi

- AP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议会档案》). *Série I*: 1789—1799, Paris 1875—1888, vols. 8—30.
- PC Paul Veyne, *Le pain et de cirque* (《面包与竞技》),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6.
- BC Paul Veyne, *Bread and Circuses* (《面包与竞技》)(上述著作的删节译本), London: Alien Lane 1990.
- DA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 PC M. Farrand (ed.).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联邦制宪会议记录》).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vols. I-II.
- YH Alexander Zinoviev, *The Yawning Heights* (《千空百疮的高地》).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在几处行文中,我以通常较好的法语译本 (*Les hauteurs*

béantes. Lausanne: *L'Age d'Homme* 1977)为基础, 稍加修正了该译本。

RF Alexander Zinoviev, *The Radiant Future* (《光辉的未来》),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前 言

十年前,我发表了本书第 1 章和第 2 章的较早版本,分别是在《社会科学信息》(*Informations sur les Sciences Societies*) (1980)中的对保罗·韦纳的一个研究,和在《欧洲社会学档案》(*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980)中的对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的一个批评性解释。在第一篇文章中,我表明,韦纳深深地受到了黑格尔和托克维尔的影响。我又继续写道:

在这篇文章中,我又为这两种原有的参考文献增加了第三种参考文献,它就是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的《千空百疮的高地》(*The Yawning Heights*)。季诺维耶夫的书既可以阐明这篇文章,也可以被它所阐明。以韦纳、托克维尔和季诺维耶夫作为永远的参考文献,通过对威权社会、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在崭新和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政治社会学。

在第二篇文章的介绍性注释中,我也说了类似的话:

由于一种令人愉快的巧合,我在阅读季诺维耶夫的作品的同时,正在阅读《面包与竞技》(*Bread and Circuses*),也正在重读《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我将经常有机会指出这三本书共同拥有的要点,并且希望随后可以就这些共同点作为一个主题另外进行一番研究。

viii 我常常考虑要完成这项计划,但是直到 1989 年,我才有了这样做的机会。那时,我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斯蒂芬·赫尔姆斯一道,受到(巴黎)理工学院(the Ecole Polytechnique)的应用认识论研究中心(CREA)和雷蒙·阿隆学会(the Institut Raymond Aron)的邀请。我做了一系列关于托克维尔的演讲。我将《托克维尔的心理学》作为我的标题,正是本书第 3 章和第 4 章的主题。那时,我考虑到,关于韦纳和季诺维耶夫的文章是否具有足够的内在价值,可以和最近关于托克维尔的演讲稿放在一起,构成一本小小的政治心理学文本。在阅读这些东西时,我发现了一些晦涩的段落和一种偶尔浮夸的风格,使我如鲠在喉。但是,我认为,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用来建构的更健全的要素。我增加了一篇导论性章节,以此试图解释:政治心理学已经被长久地忽视,作为一门认知性学科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为什么可以提供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手段,以理解过去和当前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与运动。

本书的英语译本做了非常全面的修改,和我修改初版的原因大体相同。结果证明,由于我才疏学浅,各种在法语版本中合情合理,甚至深刻动人的观点在英语译文中并没有摆脱低沉的

风格。尽管这些观点并非鸡零狗碎，却由于我使用了一种非我所长的语言，太希望实现它们的简洁与文雅，而造成了上述问题。此外，我做了全面的修改，以减少和我的其他英文著作相重复的地方。对遗留的重复之处，我表示歉意。我认为，如果不破坏本书的平衡风格，就不能清除这些重复之处。

导论：什么是政治心理学？

下面的四章以实例说明了政治心理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价值。正是在这些细节性分析中，才可以为本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寻求一个答案。这篇《导论》的目标是提供一些先导性的说明，所以提出的要求：描述该学科的作用与范围，展示它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并解释我所选择的方法。

理论相对于机制

我将从这三个要求中的最后一个要求开始。在解释一种理论路径(a theoretical approach)时，为什么集中于作者而非理论自身似乎更有益？尽管韦纳、季诺维耶夫和托克维尔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们的辉煌外表不会成为对一种统一性理论进行系统解说的障碍吗？一个人必须是天才才能成为政治哲学的从业者吗？

我的答复是，选择这三个作家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统一性，

尽管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事后诸葛亮式的(post factum)。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政治理论家们提出了无数的政体(political regime)类型。每一种政体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陷,没有一种政体可以声称拥有特别的地位,或拥有和事物本质格外密切的联系。对韦纳、季诺维耶夫和托克维尔的选择,表明了我们把政治体系划分为威权政体、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authoritarian, totalitarian, and democratic regimes)。如果我们问,这样一种三分法是否全面无遗,或者这些类型是否彼此独立,那么,在两种情况中,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意大利城市国家并不完全属于其中任意一种类型。再比如,据托克维尔而言,民主不仅包含着无处不在的和到处扩张的极权主义萌芽(不管这种极权主义是多么的温柔和具有保障功能),而且还具有产生一种工业贵族制的风险,而工业贵族制会孕育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这些倾向可以在民主框架中发育出来,而不会取代民主框架。历史所形成的政体马赛克肯定要比这种三分法所提供的色彩丰富得多。

当然,通过引入混合政体(mixed regimes),有可能对这个虚构的问题提供一种虚构的解决方法,有点像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结构(social formation)这个概念以解决在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僵硬划分一样。当然,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把历史上的政体放在一个三角形中,三个“纯粹”政体位于三个角上。把这个想法更进一步是没有价值的。在威权政体、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所进行的区分在我看来似乎富有成效,为什么?原因是这种区分既可以包容大部分的历史政体,又有可能认定和分析在所有政体中运作的心理机制。换言之,这三种类型的政体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也可以容纳那些不同体制的政体。

政体类型学是一种脆弱的和人为的建构，只能服务于有限的目的。而一种关于机制(mechanisms)的目录是更可靠和更有用的工具。

机制，这是个关键词。它将会在这本书中大量地出现。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的进步并不取决于一般理论的建构，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帕森斯社会学或经济均衡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equilibrium)。这些理论的目标，即建立普遍与永恒的命题，不管是今日还是未来，总是一个虚幻的梦想。^① 尽管相反的看法普遍存在，替代这种法则式思维的并不仅仅只有叙述性的或描述性的表达方法。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为机制的研究留下了位置与必要性。我不会提出一种正式的定义，仅提供一种非正式的说明：一种机制是一种特定的因果关系模式，在事件发生之后可以被发现，但极少能够被预见。下述一些事例将会澄清这种说明。

在第1章和第4章中，我考察了“酸葡萄综合征”(sour grapes syndrome)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愿望根据实现愿望的手段而进行调整。相反的机制也可以看得到：由于有时候，我们想得到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拥有它。如果我们考虑极权政体中公民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谴责西方自由和强调西方社会罪恶的人非常像拉封·丹寓言中的狐狸。在那些采取相反观点的人们中间，会有一些人想得到他们自己缺少的自由，因为他们自身值得拥有自由；无疑，也会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想得到自由，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拥有自由。没有先验性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三种人物类型不应该同时共

^① 对于这种效果的更早观点参见韦纳的著作(Veyne 1984)和鲍登的著作(Boudon 1986)。也参见埃尔斯特特的著作(ch. 1 of Elster 1989a)。

存,也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类型可以观察得到。

在第4章中,我探讨了信仰(beliefs)与爱好(tastes)的形成,它们并非是对外部环境愿意表示顺从而产生的一种结果,而是对他人信仰与爱好愿意表示顺从而产生的一种结果。这里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的机制:信仰与爱好的形成是一种(无意识的)标新立异的愿望所产生的结果。这种现象不应该同仅仅对他人的毫不介意(参见第2章)混同起来,它可以同不断流动的社会关系中所存在的同性质的东西共存。比如,我们可以用这些措辞分析选举行为。一些投票者往往支持可能会赢的候选人(“锦上添花效果”(the “bandwagon effect”),而另一些投票者往往认同可能会输的候选人(“雪中送炭效果”(the “underdog effect”)。^①

4 第三个事例涉及和利他主义动机相关的优良气质。^② 一些人是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者,意思是说,他们对慈善事业的捐助绝不依赖于他人捐献了多少。在有条件的利己主义者的情况中,一些人所服从的准则禁止他们比自己同等的人捐助得更少。而另一些人采纳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了相反的结果:由于来自他人的大量捐助改善了受惠者的境况,因此(假定在金钱上存在衰减的边际效用的话),额外的捐助不太有效,从而使得这些人不愿给出捐助。在这里,选举也提供了一种范例。投票站中的大批人群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善,如果他们不存在,民主制就会崩溃,所以,个人选票被视为是对共同体的赠与。对于一些人来说,当普遍的投票愿望非常高昂的时候,投票义务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强制性。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当普遍的投票愿望衰减时,

^① Simon (1954).

^② 这个问题在埃尔斯特(Elster 1989b)的著作(ch. 5 of Elster 1989b)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探讨。

这是一种更强烈的义务。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嫉妒心理学，将在下文的第4章进一步探讨。嫉妒对象的界定受到两种机制中的其中一种的控制。一方面，存在着一种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由于它的作用，嫉妒习惯往往会蔓延开来。据普鲁塔克而言，一旦嫉妒敌人的习惯形成，“它就被固定下来；然后由于习惯，我们开始仇恨和嫉妒朋友。”^①另一方面，存在一种补偿效应(compensation effect)：如果嫉妒在一种发泄渠道中受到了阻止，它就会寻找另一种渠道。(关于这两种机制的更多介绍，参见下文的第4章。)普鲁塔克认为，“由于嫉妒是一种生活事实，把它倾倒在敌人，通过排泄你的嫉妒潜能，敌人会让你对朋友的成功感到更愉快。”^②我们不能得出普鲁塔克自相矛盾的结论，而是要更宽容地对他进行解释，指出任何一种机制都可以在不同场合运作。

如果任何人陈述了两个相反的一般命题，实际上是陷入了自我矛盾的状态。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既主张，人们偏爱的是他们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不能拥有的东西，又主张，他们偏爱的是他们不能拥有的东西；既主张，他们像他人一样思考，又主张，他们和他人进行相反的思考；既主张，当他人捐助更多时他们捐助更多，又主张，当他人捐助更少时他们捐助更多；既主张，对敌人的嫉妒会强化嫉妒朋友的倾向，又主张，对敌人的嫉妒会削弱嫉妒朋友的倾向。如果其中一个命题是正确的，另一个必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要恐惧自相矛盾，可以坚信两种相反机制的存在。一种机制的独有特色不是它可以被普遍地用来预测和控制社会事件，而是它体现了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因果

① Walcot (1978), p. 36.

② 同上。

联系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和精确性,可以使我们在不同背景中确定它的存在。它绝不是一种理论,但它也远远地超出了一种描述,由于它可以作为一种模型,用来理解其他还没有遇到的情况。

从多元的机制转向统一的理论意味着,我们应该可以提前确定此种或他种机制被激发的条件。在什么环境中当他人捐助更多时,人们也会捐助更多?或者换而言之,在别人捐助更多时自己也同样这样做,采取这种做法的人们的特征是什么?我自己的观点是,社会科学当前还不能识别这样的条件,而且很可能会永远保持这种状况。使用实验程序,人们常常可以确立下述类型的一般命题。在条件 C_1 、 C_2 …… C_n 中,我们观察到了机制 M_1 。在条件 $C/1$ 、 $C/2$ …… C/n 中,我们观察到了机制 M_2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由于条件的可能变数太多了,我们不能确定在每一种条件中运作的特有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以实验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既是必需的又是不足的原因。它是必需的,因为在纯粹状态中它所培育的机制在其他状态中就会被忽视;它又是不足的,因为在实验室之外,它具有非常小的预见能力。^①

6 对机制的认定在其他方面也是有用的。社会科学家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所确立的相互关系虽然在统计中数量众多,却往往相当微弱。在这些情况中,我们或许要问一下,这种微弱的相互关系是否真的没有掩盖两种强烈的相互关系,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② 比如,可以设想,我们发现了存在着一种微弱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当他人向慈善事业捐赠更多时,人

① 对于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有益介绍参见尼斯比特和罗斯的著作(Nisbett and Ross 1980)以及阿伦森的著作(Aronson 1988)。

② 关于相似的观点,参见刘易斯(Lewis 1982, p. 32)。

们也会捐赠更多。这种倾向很可能是上文我讨论过的两种对立机制的净效应，具有比实用主义反应稍微强烈的（指导更多人的行为或者在更多时间内指导人们行为的）互惠准则。

也可以考虑另一个非假定的例子，即沃尔特·米斯切尔的著名发现：在不同环境中，行为的连贯性往往相当薄弱。^①人们在工作场合可以是好斗的，而在家中可以是温和的；在一种环境中自私，而在另一种环境中利他。根据当前的研究，这个发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种理解是，人们或许把环境视为某种机制的激发者。然而，另一种理解是，我们或许假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我们预先使用一下第4章的探讨。比如，一些人或许会受到**溢出效应**的支配，所以，在一种领域中推迟满足的能力会产生一种在所有生活范围这样做的一般习惯。^②节食减肥者或许发现，放弃抽烟更为容易。另一些人或许会受到**补偿效应**的支配，所以，其内驱力如果在一种领域中的发泄受到了阻碍，就会在另一种领域中寻找一个出口。如果节食减肥者需要偶尔给予自己一点面包，并且需要为自己的严格节食计划给予奖励，他们就会发现戒烟是相当困难的。^③在这些情况中，一种集中起来的微弱的相关性会掩盖相反的、不太集中的、强烈的相关性的存在。^④

现在对机制做最后一次评论。根据所给出的例子，机制似乎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心理学。然而，我们可以将心理学机制作为材料建构社会学机制。例如，在下文探讨革命行为时，我指

① Mischel (1968).

② 安斯利的著作(Ainslie 1992)为这种效果提供了印象深刻的证据。

③ 对于这种效果的发现，参见尼桑的著作(Nisan 1985)。

④ 也参见 p. 9 注释的评论。

出,不同种类的动机如何相互作用,产生出了一种滚雪球效应(a snowball effect),而其中任何一种动机都不可能单独产生出这样一种效应。在第4章,我表明,被托克维尔所认定的一些心理机制如何相互作用,可以用来解释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就像个人层次的机制一样,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构大部分具有偶然性。我们不能够事先指明,何时会出现这些个人动机的混合,从而产生集中性的现象。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政治心理学的价值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假定联系在一起。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饱受誉议的信仰,但是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普通的信仰。^①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原子论式的观点(它承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要简化为单细胞生物的属性);它并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它同任何一套特定的动机相适应);它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在这里,它是完全中立的);它并不意味着愿望的先天的性质或“获得的”性质(它同这样一种观点相一致:愿望是被社会所塑造的,即,它是被其他个人所塑造的);最后,它并不同政治个人主义相一致(它作为一种方法论信仰,同任何政治立场和道德立场相容)。

然而,针对它所提出的简化论(reductionism)指控,它的确感到内疚,因为它要求用简单之物解释复杂之物。这种原则在

^① 在埃尔斯特特的著作(Elster 1989c)中,对此谈论甚多。

面对各种类型的整体蒙昧主义时带来了科学进步。^① 像任何类型的简约论一样，作为我们已经获得的科学工具，它有时得到了不成熟的和过于热情的使用。这样，帕斯卡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不是笛卡尔信仰原子论，而是他企图实施原子论：“我们必须概括地说：‘这是由数字和运动构成的。’因为这一点是真实的。然而，要说出它们具体是什么内容，并且要构造出这样的机器，那就太荒唐了。因为这样做无用、不可靠而又痛苦。”(Pensees, 79.)

既然这样，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一种信仰的主旨同它所受到的滥用混淆起来。我们可以同意，许多关于革命的“经济”阐释是荒唐的，然而，必须强调的是，革命舞台上的演员是人，而非阶级。（在这篇《导论》中，随后我们会看到，革命的发展怎样可以根据由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提供的视角来进行理解。）我们也不能把社会制度似乎看做是一个坚如磐石的整体，因为它们基本上是许多人的集合体。如果它们并非如此，我们怎样才能够解释它们的腐败和它们的权威的解体呢？而且，如果它们的不稳定性需要在个人层次上得到解释，难道不应该为它们的稳定性

^① 这里有一个机会谈论一下我在使用术语时有可能造成的混乱表象。在我的早期作品(Elster 1983a)中，简化论也被描述为对机制的寻求，但是，和这里所使用的这个术语的意义并不一样。根据这种早期的观点，理论和机制之间的不同是一种个别精确度上的不同。一种理论是一种像法则一样的“如果，那么”陈述，把一种先行的状态同一种后续状态联系在一起。一种机制提供了位于两种状态之间的因果联系。在缺乏机制的情况下，法则仅仅是一个黑盒子(black box)(但是参见 Suppes 1970, p. 91 的这一点：一个人的机制是另一个人的黑盒子)。在现在的阐述中，理论和机制在普遍性程度上而不是在个别精确度上存在着不同。在我早期使用的术语中，从理论到机制就是从“如果 A，那么总是 B”到“如果 A，那么总是 C, D, E, F 和 B”。根据这里陈述的观点，从理论到机制就是从“如果 A，那么总是 B”到“如果 A，那么有时是 B”。然而，我也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即“如果 A，那么有时是 C, D, E, F 和 B”。